



# 博士「生」了沒？

## ——台灣社會學教學研究人力的現況與未來變遷的分析<sup>#</sup>

陳東升、陳也禎\*

### 一、前言

鳳凰花又綻開、驪歌聲又響起。「畢業等於失業」的壓力，即便是已過五關、斬六將的博士生也都能清楚感受。在縱情研究之餘，也莫不兢兢業業、人人自危。或許有人會帶著期望，認為失業問題根本是個假議題，是社會氛圍建構出來虛幻假象。但不可否認，「時代已經不一樣了！」，社會學最高等學術人才就業環境已然發生量變與質變。那麼差異、變化為何？社會學博士目前就業的狀況如何？未來的出路又何在？

目前，應該所有人都已能些微、模糊的「感覺」到，社會學博士覓得教職工作變得比較困難了；也「感覺」到，在社會學領域優遊的博士後研究員愈來愈多、時間拉得愈長了。然而這些感覺，可能並不只是個人心理敏感，更是源自社會學就業結構的劇變。因此，我們試圖以有限的時間與資料來勾勒此一現象。這些經驗資料並不很完備、亦不可能精準無缺失，但可大致描繪出一個未來的景況，為社會學博士班的目的、招生、教育、訓練、就業等問題，以及學界該如何自我修正步伐、調整航行方向，提出一些基本的討論基礎。

### 二、資料來源與概念定義

#### 1. 資料來源：

<sup>#</sup> 撰寫本文目的是為了提供台灣社會學會同仁意見上的交流與討論，文章觀點並不代表台灣社會學會立場。由於資料取得和整理有許多限制，分析結果的討論無法周延，敬請學界同仁提供資訊或任何修正建議。作者要感謝相關系所主管及行政人員，以及瞿海源教授、章英華教授、蘇國賢教授、尤美琪、黃克先、卓立寰、施麗雯等協助蒐集及提供寶貴資料。蘇碩斌教授協助全文的文字修改與潤飾，還有范綱華教授重新檢驗數據，並且修正文中模糊、不恰當的詞語，謹此致謝。

\* 陳東升，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陳也禎，台大社會學系兼任助理。

相當幸運的，在資料蒐集上獲得許多先前研究者提供多個已彙整的社會學者資料庫。這些基礎工作包括：瞿海源教授長期持續蒐集國內社會學者資訊，並毫不保留提供截至 2007 年的台灣社會學者資料庫；章英華教授近兩年執行國科會社會學學門發展案計畫所更新與增添的資料；蘇國賢教授建立社會學研究著作索引與指標計畫時所蒐集的研究人才學經歷資料；設有社會學博士班的東海、台大、政大和清華等四校提供的自我評鑑報告書<sup>1</sup>。另外，亦透過美國西北大學的黃克先同學、紐約市立大學的卓立寰同學、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的施麗雯同學與駐英文化組提供的在美國及英國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人數和相關資料。在此基礎上，我們合併、整理、檢驗、再蒐集相關資訊<sup>2</sup>，企圖建構更為完整的資料庫<sup>3</sup>，也做為本文初步分析的成果。

## 2. 樣本及分析方法：

首先，將學者任職系所性質分為三個類別：社會學專門領域（A）、社會學相關領域（B）、非社會學領域（C）<sup>4</sup>。其次，在三個類別單位之中，再以兩個標準來認定任職教研工作的社會學者：一是在社會學相關科系任職<sup>5</sup>，二是最高學歷（博士或是碩士）為社會學範疇<sup>6</sup>；兩個標準之「聯集」（符合其中一個標準即認定為社會學教研人員）樣本，共計 394 人。但是，接著分析整體就業狀況時，共有 13 名博士後和 1 名專案教師不列入計算，因為博士後和專案教師並非長期穩定的職位，因此剩下的樣

<sup>1</sup> 台大和東海是 97 學年度的評鑑報告書，然而政大和清華是 96 學年度的報告書，不過，為求謹慎，之後統計就讀中博士生的的人數、分布或是畢業博士的人數，我們與各學校的負責人員重新確定數據。

<sup>2</sup> 因為資料庫裡有些人的資料有缺漏，我們也嘗試用搜尋引擎來尋找與比對資料。

<sup>3</sup> 為了保護個人的隱私權，本報告將不會揭露個人的資訊，只以整體數量分析的結果呈現。

<sup>4</sup> 三個類別分別有：A 類型的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應用社會學、性別研究；B 類型則包括：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社會發展、國家發展、資訊社會、教育社會、社會暨政策科學研究、區域研究、科技與社會、醫療社會、民族文化與族群關係；最後，C 類型涵括：通識中心、管理學院、公衛學院、醫學院、新聞及傳播、生農學院、犯罪學、文學院、勞工研究、教育學院、都市計畫。

<sup>5</sup> 如果是利用一開始提到的分類類型（ABC），那麼這個標準包含 A 和部分的 B，A 類型任職的單位清楚的標明「社會學」，至於部分的 B 包含了像是：人文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所等等，也被列為符合社會學者的標準之一；但 B 類型中的社工、社會福利則歸為另外的專業領域，並非社會學者的範疇。

<sup>6</sup> 除了最高學位為社會學，有些學科（像是社會心理、教育社會學）也會採納。另外中山學術研究所、國發所、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部分 B 類型）的畢業者也納入樣本。



本數 380 人為有效樣本。

有效樣本之現職系所、出生年、最高學位取得狀況、畢業年份等，作為量化分析的各個變項。在分析之中，現職系所可再細分為公立 / 私立、一般大學校院 / 技職體系 / 中研院，而學位取得狀況可再細分為國內取得 / 美國取得 / 其他國家取得，以提供細緻探討的基礎。

### 3. 資料限制與缺漏

最初資料處理完畢後掌握到的 394<sup>7</sup> 個樣本中，有 52 人沒有出生年齡資料，其中 32 個樣本根據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時間反推估算而得<sup>8</sup>。另有 41 個樣本沒有最高學歷畢業年份資料、7 個樣本沒有最高學歷地區資料。<sup>9</sup> 若以 380 個有效樣本計算，有 47 人沒有出生年齡資料，其中 24 人為推估。另外 40 人無法知道最高學歷畢業年份、6 個樣本沒有最高學歷地區資料。至於國外博士班學生，由於沒有管道以取得在日本、德國、法國及其他地區的相關資料，因此目前無法將這些地區學生的資料納入分析。

在分析博士生的就業狀況時，本報告僅將工作地點限於台灣學界，並不包括海外的部分；因此任職、任教於海外機構之社會學者，將不列入樣本。另外，社會學畢業、但是任職於非教研工作（私部門、第三部門、立法院等）或是正在服役、已經退休、去世者，也不包含在資料裡。這些限制雖影響報告之精確，但不致顯著改變分析的結果。等未來繼續蒐集相關資料後，或許能更進一步的理解台灣社會學者和全球就業市場的關聯性和未來發展的可能。

## 三、資料分析結果

### 1. 總體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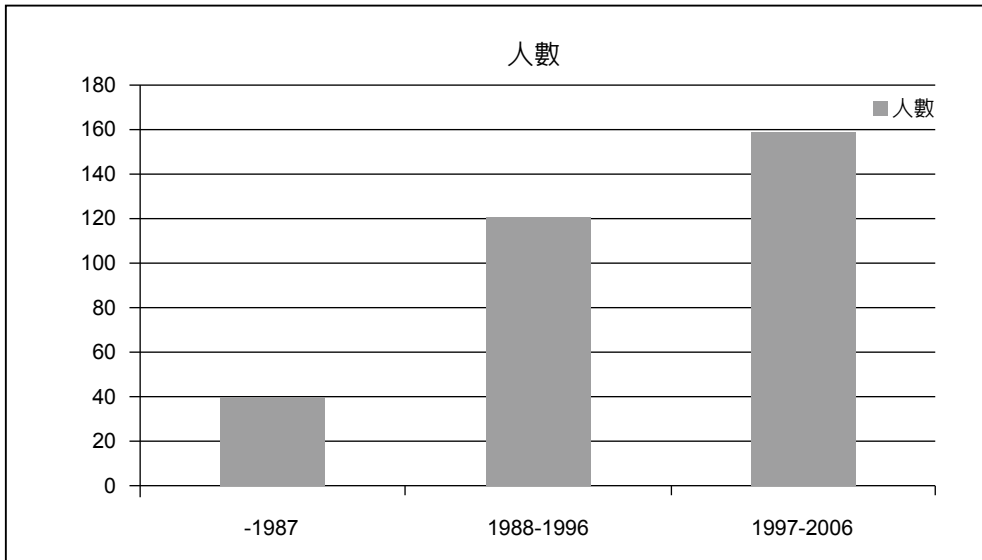
從圖一可看出台灣的社會學教研人數<sup>10</sup>的成長趨勢：

<sup>7</sup> 其中包含 13 個博士後、1 個專案助理教授。但是，進一步分析教研工作類型時，博士後和專案教師將不涵括在樣本中。

<sup>8</sup> 估算方式是：在全國博碩士論文網搜尋其碩士論文發表的時間，以之為作者的 25 歲，再來估算其出生年份。

<sup>9</sup> 除了資料處理完畢仍有缺漏的部分，章英華教授的社會學教研人員樣本資料庫，已將過世的社會學者刪除。

<sup>10</sup> 這裡的教研人員仍包含博士後和專案教師，因為此時想要探討的是教學研究整體的人數，而非就業狀況或工作機會。



圖一：社會學教學研究人力成長趨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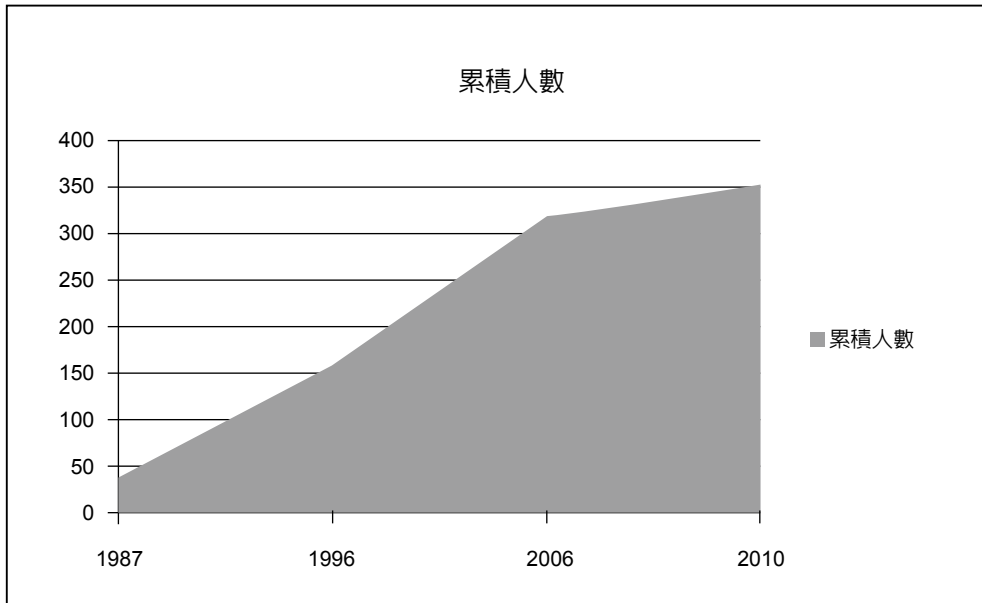
圖一是運用學者的學術年齡<sup>11</sup>建構出時代的社會環境，可以較具體描繪社會環境轉變的過程<sup>12</sup>。為了較清楚比較出，經過時間的推移，社會學者增加的趨勢，以1987年台灣解嚴為分水嶺，再以10年為一個時間單位（至2010年），可以發現：1987年之前共有40位社會學者，1988年至1996年間增加至121位，1997年至2006年之間共有159位，而2007年至2010年之間又增加33位。觀察人數累積圖（圖二）則可突顯從事社會學研究及教學人口有不斷累積和上升的趨勢。

因為博士後和專案教師為轉換到正式職位的過渡階段，因此先刪去13名博士後和1名專案教師，剩下有效樣本為380人，再進行任職機構的分析。有效樣本任職於一般大學者319人（其中公立147人、私立172人）；技職體系大學院校者23人（其中公立5人、私立18人）；任職中研院者37人；任職公立專科學校者1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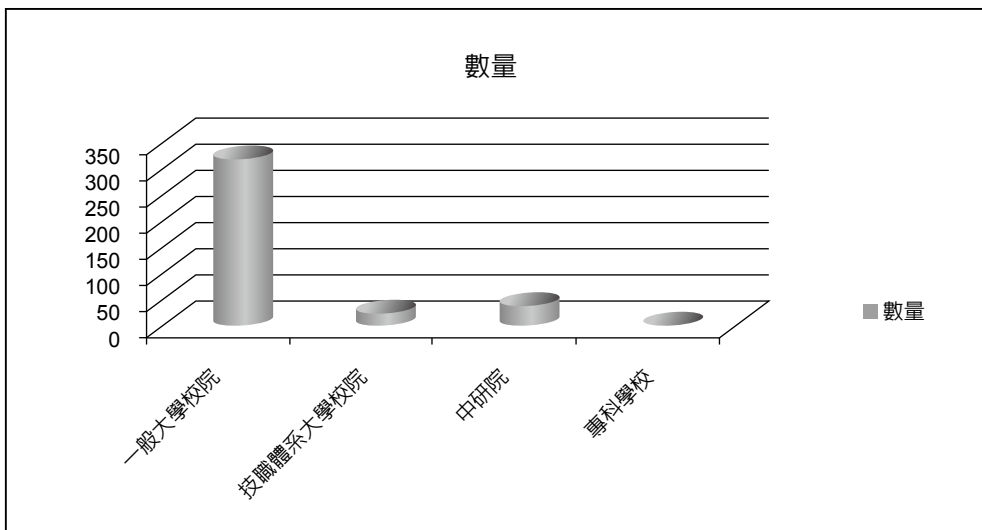
若是以任職機構的類別（A、B、C）來區分，任職A類者156人、任職

<sup>11</sup> 我們將學術年齡起始點定為最高學位畢業的年度，樣本中有45位無資料，有效樣本為343位。

<sup>12</sup> 但是，由於章英華教授近兩年蒐集的資料本身就已經去除已過世的社會學者，而且已退休者的資料也不夠完全，還有博士後或是專案教師的人數，也有缺漏。因此，我們可能低估了整體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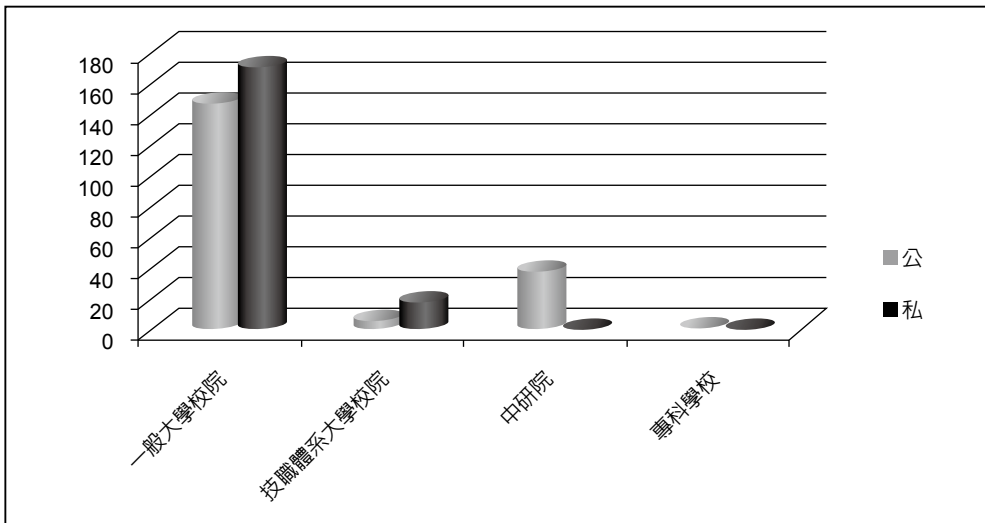
圖二：社會學教學研究人力成長累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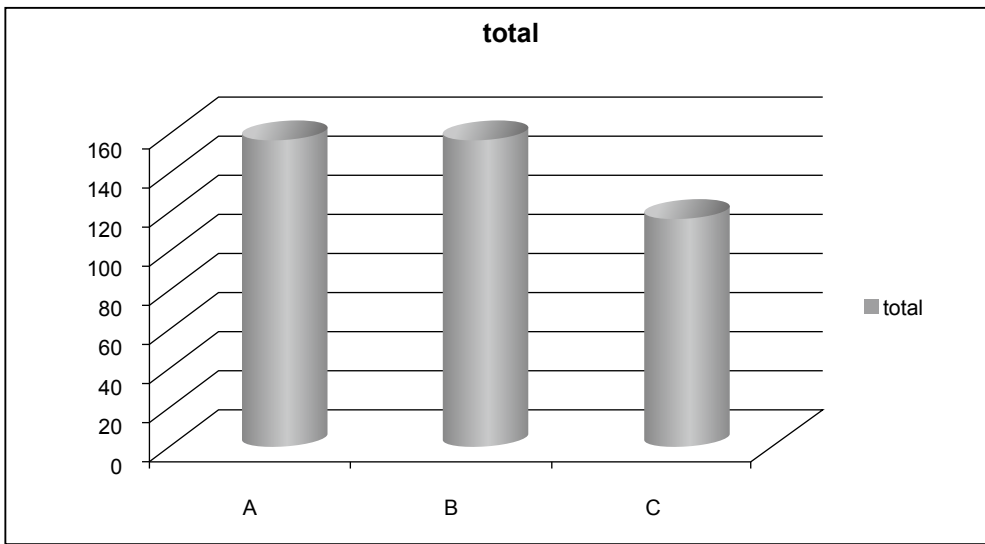
圖三：社會學教學研究人力任職機構分布

B類者 108 人、任職 C 類者 116 人。如圖三、圖四、圖五：

這麼快速增長的社會學者，都是從那兒畢業的？根據資料，可以歸納出表一結果：



圖四：社會學教學研究人力任職機構的分類 (公立或私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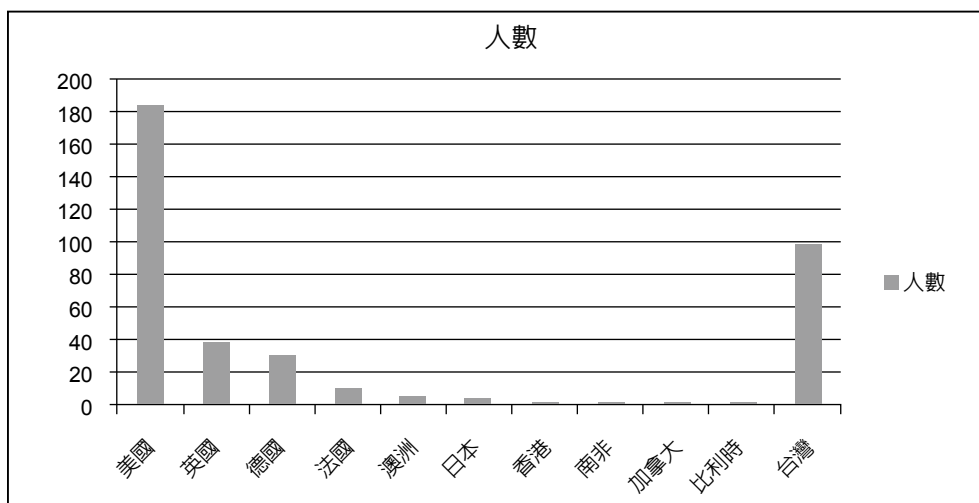


圖五：社會學教學研究人力任職機構類型

表一：各國取得最高<sup>13</sup>學位的人數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澳洲	日本	香港	南非	加拿大	比利時	台灣
184	38	30	10	5	4	1	1	1	1	99

<sup>13</sup> 在台灣取得學位並擔任教研工作者，共有 3 名最高學位是碩士。



圖六：各國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數

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台灣任職的社會學者，以在美國取得學位的人數最多，再來是台灣，接著是英國。

## 2. 比較：

知道了社會學者從那裡來，可再觀察這些在不同國家畢業的社會學博士的就業狀況，如表二與表三所呈現<sup>14</sup>：

表二：各國博士就業狀況（公立或私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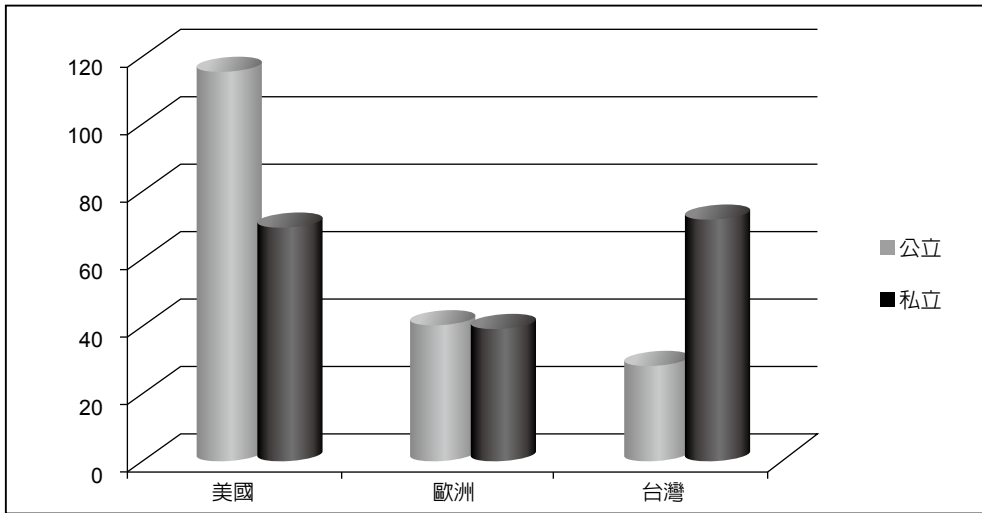
	美國	歐洲	台灣
公立	115	40	28
私立	69	39	71

表三：各國博士就業類型（A、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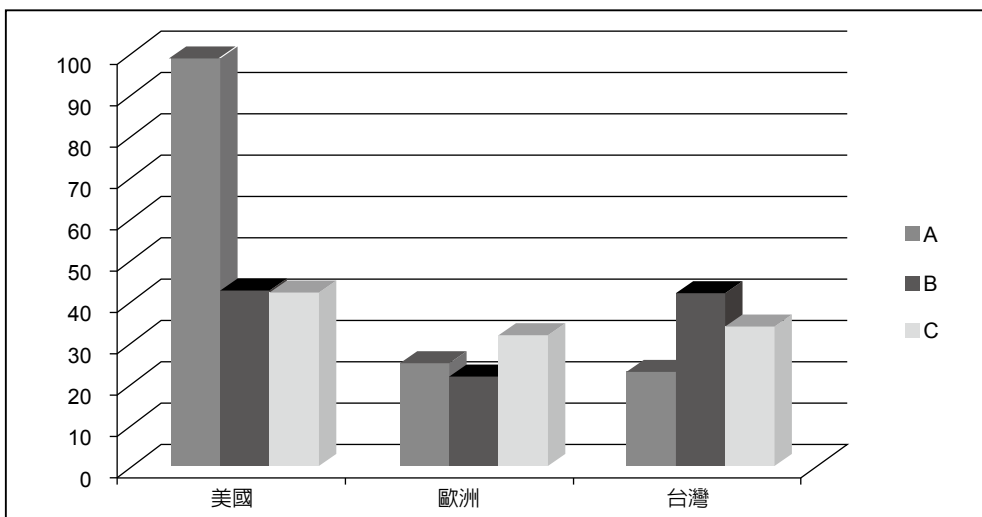
	美國	歐洲	台灣
A	99	25	23
B	43	22	42
C	42	32	34

根據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在美國取得學位者，任職公立學校比例較高，且多數任職 A 類系所；歐洲取得學位者，任職公立大學的比例略高於私立大

<sup>14</sup> 從台灣畢業的博士共有 99 人，但這些人並不侷限在「畢業於社會學」，更包含了一些畢業於政治學、教育學等等科系的博士。接下來針對台大、東海及政大三個學校的「社會學」博士有個概況的比較，其樣本數有 80 人。為了不讓讀者在閱讀時，對數字產生誤解，在此特別獨立說明。



圖七：各國博士就業狀況（公立或私立）



圖八：各國博士就業類型（A、B、C）

學，任職C類型多於A類；台灣取得學位學者，任職私立學校比例高於公立，且任職B類型多於C類型。<sup>15</sup>

<sup>15</sup> 本文不認為可以做出「國外博士因為任教於公立的人數多於台灣畢業的博士，所以國外博士優於台灣畢業博士」的推論。國內外博士之比較，應該謹慎考量其他面向的變數（例如台灣成立博士班的時間和其他國家不同等），這個議題有待繼續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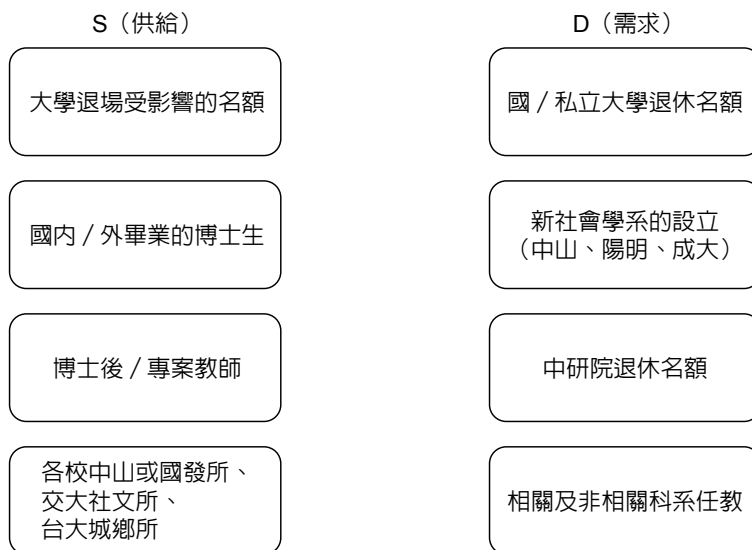
若將焦點放在台灣社會學界養成的博士，則得分析如下。到目前為止，東海、台大、政大三校，歷年來總計有 95 人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其中，80 人繼續從事教研工作、4 人不在國內、1 人待業、1 人已故、7 人其他（服役中、私部門、立法院、第三部門等）。自這三所學校畢業的博士且繼續教學研究者，就業狀況大致如表四：

表四：台灣各校博士（東海、台大、政大）就業狀況

		畢業學校		
		東海	台大	政大
任職狀況	公立	10	17	4
	私立	33	12	4
	A	10	12	2
	B	17	3	3
	C	16	14	3

台大畢業者，一半以上任教於公立大學，東海畢業者愈七成任教於私立大學，政大任職於公私立大學者人數相當，但任職於公立大學者多為博士後身分。至於任職的類型部分，台大分布在 A、C 型，東海是 B、C 型多於 A 型；政大則是三個類型無明顯差異。

#### 四、博士就業市場的供給與需求



如前所述，本文分析就業市場僅限於台灣地區，因此以上只是利用簡單、直觀的供需法則勾勒社會學博士就業市場現況和預測。說明如下：

供給面：目前台灣社會學界潛在的博士人力，大致有以下四個來源：(1) 國內外預計新取得學位的社會學博士<sup>16</sup>、(2) 台灣未來因大學退場而釋出的學者<sup>17</sup>、(3) 博士後和專案教師等暫時性工作<sup>18</sup>、(4) 社會學本科以外的相關科系博士（例如中山所、國發所、社文所、城鄉所等）。可見，社會學教研市場，面對的並不只是單一系所博士生的競爭，而是相關係所博士生的競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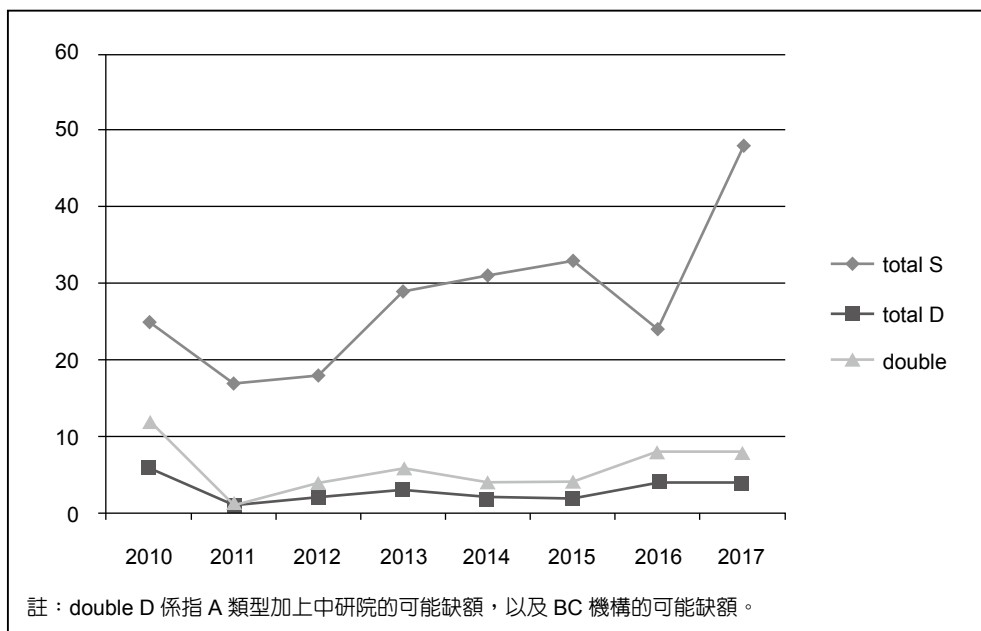
需求面：以目前台灣社會學博士出路來看，缺額大致有以下三個來源：(1) 社會學系所的可能缺額：利用現職系所的分類（ABC），預估 A 類型系所未來屆齡退休（以 65 歲估算）可能釋出的缺額；另外特別獨立估算中研院（AB 類型）未來幾年屆齡退休（以 65 歲估算）可能釋放的缺額。(2) 新設系所的可能缺額：未來幾年可能新設社會學系的師資需求，不過這部分的資訊仍不夠明確，因此未具體評估；(3) 相關係所可能缺額：由先前統計之所有社會學者就業狀態得知，A 類型學者為 156 人，佔總樣本的 41%，BC 類型學者合佔總樣本的 59%，約為 A:B+C=1:1；亦即，BC 系所未來釋放給社會學博士的可能缺額，約等於 A 類型加中研院的可能缺額。因此，(1) 乘以 2 即約為未來幾年社會學博士求職的可能總缺額。不過，這個預估是稍樂觀的，因尚有幾個變化須列入考慮，包括：部分傑出教授退休後接受其他機構禮聘再次任職的可能性，以及國家政策是否延長退休基數為 85 或者退休年齡等，都有可能減少可能缺額的釋出。

綜觀以上的供給 / 需求量，估計未來八年（2010 年到 2017 年）社會學者就業市場的供需曲線如圖九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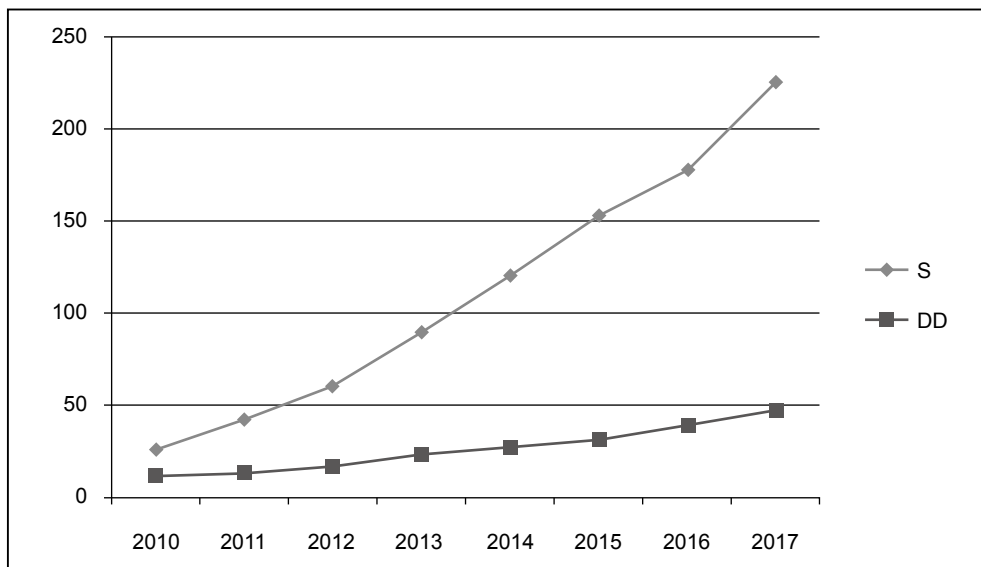
<sup>16</sup> 國內外博士生每年畢業人數的推估，我們以目前博士生就讀年級的分布來做預測。舉例來說，如果現在就讀博士班第八年以上者，我們推估這些人在 2010 年全數畢業；以此類推，2010 年為博七者將在 2011 年畢業。當然有些社會學博士班的就讀者可能是在職身份，因此畢業後就業的壓力是不存在的，我們並沒有考量這個因素，但這些學生取得博士學位後仍然有可能在教研機構求職。

<sup>17</sup> 對於大學退場受到影響的教員人數，我們是以未來八年可能有 10-30% 的大專院校受到衝擊，以最低的 10% 當基數，再乘上目前資料檔的 380 人，估計約 40 人。

<sup>18</sup> 博士後人數為國科會人文處 2009 年 1 月至 2010 年 1 月的核定人數，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及相關單位目前從事博士後人數加總得到的資料，但資料無法非常精確。專案教師人數則是以目前透過人際網絡得到的資訊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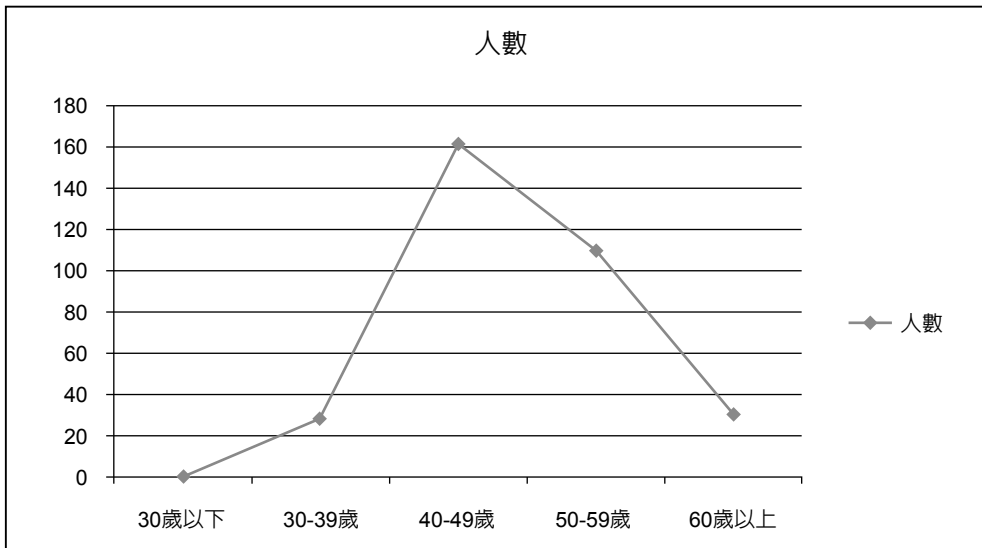


圖九：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曲線



圖十：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累積圖

若是以累積圖表達（圖十），會更加明顯的感受到供給和需求之間落差懸殊：



圖十一：台灣社會學社群教研人力的年齡分布圖

2017年社會學供給累積總量(S)估計為225人，可能缺額總量(DD)估計為47人，供需之間差距約為180人。

此外，假設380人為台灣社會學學術社群未來的飽和人數，透過資料庫中的教研人力年齡分析，發現在未來八年因為年齡因素而退休的名額約45個，平均每年是6名，低於社會學社群每年合理的替換數<sup>19</sup>，但在2017年之後，替代速度會比較快（參見圖十一），不過就業供給與需求的落差仍然存在。本文亦蒐集台大、東海、政大、清華、美國、英國等地的博士班人數分布，平均一年就讀社會學博士班的人約25位，已明顯高於前述的平均替換人數（13人或11人）。如果考慮其他在英美以外國家就讀的社會學博士，以及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可能在社會學任職的博士生人數，那麼供過於求的問題更為明顯。

## 五、總結

以1987年為起點，從前文各圖表可觀察到的整體社會環境的變遷是：

<sup>19</sup> 以380人在30年內會進行全部替換，每年平均替換人數應約為13人。如果將受大學退場影響的職位刪除，則社會學學術社群就減少為340人，每年平均替換人數則降到11人。



(1) 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或從事社會學相關教研工作的人數持續攀升，依照過去的經驗，大多數人取得博士學位後也都擔任教研工作；(2) 社會學者畢業於美國者最多，其次為台灣、英國。當中，美國回來者任職公立學校比例最高，且多數為 A 類型，歐洲畢業的學者待在公立大學者略多於私立大學，但是從事 C 類型多於 A 類；至於台灣的部分，則是在私立任教者多於公立，且 B 類也和歐洲回來者一樣，多於 C 類型。

如果範圍縮小，只比較台灣現有博士班的差異（台灣社會學博士班目前有畢業生者為東海、台大、政大），發現台大有半以上的人待在公立大學，然而，東海卻有較高比例任教於私立大學，政大則無顯著差異，但於公立任職的都是博士後身分，且樣本只有 8 個。至於任職的類型，台大分布在 A、C 型，東海是 B、C 型多於 A 型；政大則是三個類型無甚差異。

此概括性的整體印象，依就業市場的供需法則，則勾勒出未來社會學就業市場的艱辛。從 2010 到 2017 年，根據每年差距數量的累積，供給量（具有社會學專業能力者）和需求量（可能的缺額）到了 2017 年供給將遠大於需求，其間差距約為 180 個名額。這無疑將是十分艱苦的社會學教研人力供需結構，若無法嚴肅面對之，恐怕對學界新進人員、整體士氣都將造成難以預估的衝擊。

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上述的分析主要立基在供需法則，但這並不意謂應服膺於市場機制或是競爭效益。真正的意義在於，面對這個生活世界週遭可預知的困境時，如何運用社會學的想像力理出新思維。因此，我們期望以這一份資料為討論基礎，透過設有博士班系所的主管、博士班學生、學會會員，運用座談、討論、調查，集思廣益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方案，盡力緩和供需的困境、解決可能發生的衝擊。

我們期望，能夠讓充滿熱情而選擇社會學作為志業的博士生，不致茫然而毫無選擇地面對結構劇變；透過比較充分的資訊和討論、參與其中的行動者才能更加擁有自由的選擇機會，更加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學術生涯，以及從容面對眼前的困難。

對於整個人文及社會科學界來說，本文對於台灣社會學博士人才的就業市場的分析，可以當成一個案例：其他各學門可以蒐集相關資料進行必要的分析和討論，評估該學科教研人力在未來十年可能面臨的就業市場問題，並積極思考可能採取的各種方案。